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著作

# 大后方抗战 诗歌研究

吕进等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学术著作

# 大后方抗战 诗歌研究

吕进等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 / 吕进等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29-09488-1

I. ①大… II. ①吕… III. 诗歌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7946 号

## 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

DAHOUFANG KANGZHAN SHIGE YANJIU

吕进等著

---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周英斌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陈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40mm×1030mm 1/16 印张: 28.75 字数: 425 千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488-1

定价: 57.5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 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铨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贤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本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笙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心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宗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宏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



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 目 录

总 序 .....	章开沅 1
绪 论 .....	1
第一章 大后方抗战诗歌概貌 .....	11
一、重庆抗战诗歌概貌 .....	11
二、桂林抗战诗歌概貌 .....	32
三、昆明抗战诗歌概貌 .....	47
第二章 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文体特征 .....	53
一、抗战大后方的诗歌文体观念 .....	53
二、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文体转变 .....	61
三、抗战朗诵诗的文体特征 .....	75
四、抗战街头诗的文体特征 .....	90
第三章 “文协”与大后方抗战诗歌 .....	107
一、“文协”的文学立场 .....	107
二、《抗战文艺》与大后方抗战诗歌 .....	112
三、“文协”在重庆的诗歌活动 .....	127
四、“文协”在昆明的诗歌活动 .....	138

五、“文协”在成都的诗歌活动·····	141
<b>第四章 大后方抗战诗歌的区域文化特征</b> ·····	150
一、抗战时期重庆、桂林、昆明的文化气候·····	150
二、抗战时期重庆、桂林、昆明的诗歌刊物及活动·····	164
三、重庆、桂林、昆明抗战诗歌的区域文化特征·····	179
<b>第五章 “七月”诗派的抗战诗歌</b> ·····	193
一、七月派的形成及诗歌理论主张·····	193
二、七月派抗战诗歌的分阶段流派特征·····	205
三、七月诗派与重庆·····	217
<b>第六章 报刊媒介与大后方抗战诗歌</b> ·····	230
一、报刊媒介场域的生成与大后方抗战诗歌的兴盛·····	230
二、朗诵诗与《大公报》等相关刊物·····	246
三、歌谣与《新华日报》等相关刊物·····	257
四、街头诗与《七月》等相关刊物·····	265
五、叙事诗与《文艺阵地》等相关刊物·····	272
六、报刊媒介与大后方抗战诗歌的大众化·····	284
<b>第七章 抗战大后方对外国诗歌的译介</b> ·····	295
一、“文协”对抗战诗歌的译介·····	295
二、大后方对俄苏诗歌的翻译·····	305
三、大后方对美国诗歌的翻译·····	319
四、大后方对英国诗歌的翻译·····	325
<b>第八章 著名诗人在大后方的诗歌创作</b> ·····	344
一、臧克家抗战大后方诗歌研究·····	344

二、生命意识的回归与文体自觉:冯至抗战大后方诗歌研究 ...	379
三、艾青抗战大后方诗歌研究 .....	411
<b>第九章 大后方抗战诗歌中的旧体诗词 .....</b>	<b>424</b>
一、概说 .....	424
二、大后方旧体诗词的时代特征 .....	426
三、几位有特色的旧体诗诗人 .....	437
四、碧城箫管应难再——沈祖棻抗战词研究 .....	439
<b>后 记 .....</b>	<b>447</b>

## 绪 论

在抗日烽火中产生的抗战诗歌因为战争和政治因素而从地域上划分为大后方抗战诗歌(亦有人将之称为“国统区抗战诗歌”<sup>①</sup>)、沦陷区抗战诗歌、革命根据地抗战诗歌以及海外抗战诗歌。如果“把中国抗战文学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大后方文学自然便是这棵大树的主干”;如果“大后方文学最能体现出中国抗战文学的完整性与特殊性”<sup>②</sup>,那大后方诗歌在繁芜的抗战诗歌中同样具有整体性的代表意义。遗憾的是,大后方抗战诗歌的研究目前还远不如人意:没有这方面的专著,相关研究的论文也十分稀少。要在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相对欠缺的情况下展开对大后方抗战诗歌的研究,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史料的收集。抗战时期离我们虽然已经比较久远,但是史料是“史观”形成的基础,不可忽略。必须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我们在当年大后方的省区以及北京等地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史料收集与抢救,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研究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对大后方抗战诗歌的研究究竟应该从何着手,又应该将哪些内容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呢?我们认为,有五个方面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研究大后方抗战诗歌的一般特征。首先是诗歌观念问题。作为心灵的艺术,诗歌具有与非诗文学不同的审美观念,这种观念在不同时期和不

---

<sup>①</sup> 比如文天行先生在其主编的《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一书将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称为“国统区文学”。又比如苏光文先生认为:“‘大后方文学’,其实就是指1938年10月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文学。”(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sup>②</sup> 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同区域又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抗战诗歌是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而大后方作为战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抗战诗歌的观念除了抗战诗歌的共性以外,必然也有自身的独特性: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观念最集中地表现为对诗歌情感的“规定性”倡导,对诗歌审美价值的意向性建构,对诗人社会责任和民族担当意识的指认。在重庆展开的抗战诗歌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显示出抗战诗歌对主题的重视。同时,大后方抗战诗歌也出现了重内容轻艺术的趋势。从抗战时期大后方对诗歌情感内容的“规定性”倡导和审美价值的意向性建构到诗人创作路向的选择,从诗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到抗战诗歌艺术性缺失的批判,抗战大后方诗歌观念已经涉及到了诗歌内容、诗歌风格、诗歌形式以及诗歌审美等诸多重要的诗学领域。因此,大后方的抗战诗歌观念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和总结,这是研究大后方抗战诗歌的钥匙。只有首先把握了诗歌观念,才能更加合理地认识大后方抗战诗歌的各种创作现象。

在总体上探讨大后方抗战诗歌,还应该从根源上厘清它在形式和语言艺术上的特色。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后方抗战诗歌与新诗自身初步形成的传统之间的关系;二是大后方抗战诗歌与中国古诗和民间文艺之间的关系。从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率先发表《白话诗八首》至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当时新诗只走过了短短的20年历程,其自身传统的积淀尚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诗歌创作的特殊需要决定了抗战诗歌必须具有与之前新诗相异的精神和形式要素。很多人从战时语境出发看到了新诗诞生以来的诸多似乎不利于抗战的新传统,比如老舍从新诗短暂的历史传统出发,否定性地批判了抒发个人情绪的抒情诗:“廿年来的新诗没有什么成绩,在情绪方面,多数诗人还多注意个人情绪。”<sup>①</sup>因为强调抗战诗歌传播的大众化和情感接受的普适性,很多人从战时的需要出发否定了五四新诗的部分传统。但新诗在短暂的时间里毕竟多向度地完成了诗体和情感的发生发展,因此抗战诗歌难以真正完全地背离五四

<sup>①</sup> 《我们对于抗战诗歌的意见》(诗歌座谈会纪要),《抗战文艺》3卷3期,1938年12月17日。

新诗传统乃至实现对新诗的革命,它只能在新诗开创的道路上前进并成为新诗发展进程中的特殊阶段。但是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尤其是1940年以后抗战诗歌究竟是否应该继承五四新诗传统就不再成为引发争论的问题了。即便是之前主张利用民间形式的诗人也开始自觉地回归五四新诗传统。抗战诗歌是在抗战时期的特殊语境下诞生的,人们前后期对抗战认识的差异和诗歌传播接受的不同要求决定了抗战诗歌的诸多特殊性。尽管如此,抗战诗歌在形式、内容和品格上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新诗的传统,也正是二者的承续关系决定了抗战诗歌的独特性和中国新诗创作历史的丰富性。

和以情节为基本特征的叙事文学不同,诗歌的传播问题尤其特殊。而特殊时期的诗歌更是必然有着特殊的传播方式,因此对大后方抗战诗歌的研究必然涉及到它的传播问题。由于社会对诗歌审美价值取向的改变,诗的阅读和欣赏不再停留在精英读者群中,诗歌的传播也必须要有较大的突破。“国家不幸诗家幸”,当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社会对诗歌的需求会大大增加。可以说,正是民众广泛的诗歌需求使抗战时期的诗人们在诗歌传播的途径上创造出了很多新鲜而有效的方式,演绎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关于诗歌传播的丰富图景,比如朗诵诗、街头诗、歌唱诗等等。朗诵是把诗歌和舞台表演结合起来的传播方式,街头诗是把诗歌从桌面推向公众空间,歌唱诗是把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除了这三种方式之外,抗战诗歌还和绘画结合起来,采取举办诗画展的传播方式;和大众熟悉的民间文艺形式结合起来,采取利用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抗战诗歌正是借助以上这些特殊的传播方式才在鼓舞中国人民英勇抗敌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正是这些战时的诗歌传播方式使抗战时期出现了中国新诗史上诗歌深入民间的罕见的文化图景。对抗战诗歌传播方式的研究可以为今天中国新诗传播方式的重建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此外,从整体上考察大后方抗战诗歌的特征也不能忽略了它的兴起与抗战时期大量诗人、高校和文艺社团、报刊的内迁的关系。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民政府、高等院校以及报纸杂志的内迁,许多当时名满全国的诗人都到了大后方,为大后方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后方抗战诗歌也在

这次内迁潮流中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尤其是“文协”等文艺组织机构内迁之后,带动了大后方抗战诗歌的创作。比如“文协”在大后方的各个分会均组织了诗歌活动、创办了诗歌刊物等,带动了大后方诗歌创作的繁荣。同时,地处西南的大后方多是丘陵多山的地貌,物产并不丰富。抗战时期大量人员的内迁自然增加了这座山城的物质和文化供给压力。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内迁诗人作家的创作,导致大后方抗战诗歌前后期发展的失衡。当然,大后方交通和物质局限导致的诗人创作实绩的下降与大后方抗战诗歌的繁荣之间并非存在悖反的关系。也即是说,内迁诗人创作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大后方抗战诗歌的凋敝。纵向考察诗人的创作,他们内迁前后期固然有明显的变化,甚至到了后期出现了明显的停滞状况,但纵向考察大后方的抗战诗歌,抗战时期始终是该区域诗歌史上的黄金阶段,从来没有如此多的著名诗人如此集中地在此生活并进行抗战诗歌创作。因此,考察内迁潮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现促进大后方抗战诗歌发展的复杂的外围因素。

第二,研究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文体特征。诗歌的文体特征有“常”的一面,也有“变”的一面,基本模式是常中有变。大后方抗战诗歌在文体发展上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前后期变化,研究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文体特征必须首先把握这种变化。从抗战开始到敌我进入相持阶段的1940年前后,大后方抗战诗歌在文体上主要趋向于选取短小精悍的自由诗形式和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由于抗战时期发动民众抗战激情的特殊需要决定了诗歌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也正是从有利于诗歌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出发,利用民间的旧形式成了当时推动诗歌广泛传播和接受的有效途径。要使抗战时期的诗歌被更多的人甚至乡村农民喜爱和接受,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旧形式无疑是最佳选择。当然,抗战文艺不能仅仅只是提倡旧形式,也不能把利用民间旧形式当做抗战初期抗战文学应急的一种手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大众都排斥新文学形式,也不是只有利用旧形式这一条道路才能够满足抗战时期大众对文学的需求。到了1940年以后,国军节节败退,国土沦丧的面积逐渐增多,人们从最初狂热的兴奋状态中清醒过来,开始理性而冷静地认识到中



国的抗战是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于是,随着作家对现实生活体验的深入而抗战文艺开始朝着理性和深广的方向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旧形式在表现力方面的某些欠缺,新的内容必然要求在新的形式中去求得表达,所以抗战三年以后,大后方作家对抗战生活认识的深入而使抗战文学出现了转变。诗人对抗战现实认识的提高导致他们对诗歌文体的选择也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诗人对抗战现实的更加深入的体验已经不再是抗战初期的朗诵诗和街头诗这样的短诗文体所能表现通透的,于是抗战三年之后,叙事诗开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优秀之作。

朗诵诗虽然不是抗战时期首创的诗歌样式,但它却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得以蓬勃发展,是整个抗战诗歌中特色最为鲜明的诗歌文体。作为抗战文艺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朗诵诗的出现应以1937年9月15日出版的《文艺》月刊“抗战诗歌特辑”中注明以“朗诵诗”的名义刊登了蒋锡金的《胡阿毛》等作品为明显的开端。1937年10月19日武汉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由著名演员王莹朗诵的高兰创作的《我们的祭礼》“成功打开了新诗朗诵运动的局面”<sup>①</sup>,朗诵诗的创作潮流也开始得以兴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8月迁往大后方重庆,高兰、方殷等朗诵诗人也随之到了重庆,在“文协”举办的“诗歌座谈会”“诗歌晚会”以及“诗人节”活动中,诗歌朗诵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甚至在大街小巷的群众集会上也能见到诗歌朗诵的场面。然而,既然朗诵诗在抗战时期如此盛行和普及,那它与普通的诗歌相比有什么文体特征呢?从抗战时期朗诵诗的缘起、语言形式特征、诗歌朗诵艺术以及朗诵诗在接受等方面入手来论述朗诵诗的文体特征,以引起人们对朗诵诗文体的进一步探索,弥补学术界一直以来多围绕着朗诵诗的社会历史功用进行研究的不足,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功课。

在大后方乃至整个中国的抗战诗歌中,街头诗无疑是最具时代特色的诗歌文体,是抗战诗歌文体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1938年8月7日,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和边区文协“战歌社”组织了30多位诗人走上街头,将他们

<sup>①</sup> 沈用大:《中国新诗史》,福州: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15页。